

被忽视的克拉考尔：游离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批判研究

■ 连水兴

【内容摘要】 克拉考尔是一位游离于法兰克福学派之外，但又与这个学派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批判传播学者。他的大众传播研究主要包括大众文化研究、法西斯宣传研究以及电影媒介的批判研究。本文将克拉考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复杂关系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和还原，在论述其理论价值的同时，展现了其在传播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克拉考尔；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播学；传播思想史

在传播思想史的长河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1889 - 1966）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克拉考尔作为一个学者对媒介传播本身的关注不够，抑或是在理论上的贡献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强大的光芒和独特的理论谱系，掩盖或排除了许多游离于该学派的学者，而克拉考尔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一、早期克拉考尔：从事社会批判的“媒体人”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生于1889年，是法兰克福一位犹太商人的儿子，因父亲早逝，由他的叔父带大。为了事业上的打算和生计考虑，年轻的克拉考尔选择了建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并1914年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建筑事务所工作了几年。由于对哲学和社会学的兴趣，1921年他放弃了建筑行业的工作，进入《法兰克福报》工作，开始了一个“媒体人”的职业生涯。罗尔夫·魏格豪斯在他的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中，通过阿多诺对克拉考尔的职业转变如此描述：“这是一个他能欣然接受的折中之举，这可以使他利用职业上的便利涉及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论题。”^①

1921年，克拉考尔进入《法兰克福报》当记者，成为带薪正式职员。1924年，他被报社擢升为编辑，并负责新成立的影评部。这似乎成为他学术兴趣的新起点，因为从此以后，电影成为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29年4月起，克拉考尔成为《法兰克福报》驻柏林的编辑，并于从1930年4月起开始负责柏林编辑部。在此期间，他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撰写了作品《雇员们》，并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法兰克福报》连载，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他针对国内政治和社会演变发表的尖锐批评，也引起当局的不满。1933年2月，德国纳粹党策划“国会纵火案”后，

克拉考尔被迫流亡巴黎，开始了一生的漂泊。

在《法兰克福报》工作的十余年间，克拉考尔写下了1900多篇评论，成为魏玛共和国有影响的专栏作家。在早期德国，专栏作为报纸的重要内容，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战”之后变得更为重要和流行。当时的许多重要思想家，包括本雅明、布洛赫、阿多诺等，都曾经在《法兰克福报》发表文章，对现实进行关注与批判。^②克拉考尔后期颇具影响的论著《大众装饰》等，都曾经在《法兰克福报》上连载。可以说，从1921年开始的报社任职到1933年被迫流亡，这十余年间，克拉考尔更多是以“媒体人”的身份出现的。这种职业习惯和写作风格，对其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当然，克拉考尔绝对不是一个浅薄的“媒体人”，事实上，他同时也是一位对哲学和社会学有着深厚造诣的批判性学者。对此，作为其好友和学生的阿多诺有着深入的分析 and 描述。在阿多诺看来，克拉考尔“用来批判性地为自己确立思考方向的哲学立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美尔的相对主义及其“生活哲学”，连同马克思·韦伯对价值相对主义和科学客观性两者所做的明确区分；另一方面是马克思·舍勒对有宗教倾向的现象学的赞扬，以及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对俄罗斯精神的赞扬。阿多诺认为，克拉考尔“从这些哲学家那里多方吸取他们对于时代的分析，把它们当成是对这个世界、对人类之间关系以及对科学的无能的一种去神秘化，并将这种去神秘化变为走出当前危机的出路”^③。在思想上，克拉考尔起初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批评者，但后来发生了转变。1920年代中期以后，克拉考尔甚至认为“当代真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④。可以说，克拉考尔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使自己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指导思想更为接近了。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职业和学

术背景，德国学者洛伦茨·耶格尔在描述克拉考尔与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的关系时，这样表述：“人们把西格弗里德·克劳考尔简单地称作批判理论的‘媒体人’，尽管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社会学研究所的核心圈子”^⑤。

二、克拉考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渊源

在法兰克福学派众多学者中，阿多诺是较早和克拉考尔建立关系的。根据阿多诺的回忆，他和克拉考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认识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阿多诺，就和长他14岁的克拉考尔成为好朋友，他们之间“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两人定期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阿多诺说：“他特别擅长教人看书，使我对康德产生了兴趣。一开始我就明白，在他的指引下，不是将这本书作为简单的认识论来学习，不只是去分析构成科学方面有效判断的条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用密码写成的书，从中可以看到精神在历史上的状态，带着一种模糊的期待，希望自己能获知一些真理。”^⑥甚至可以说，“多亏了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阿多诺才能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学和当代分析非常熟悉”^⑦。后来，克拉考尔把他的论文《侦探小说》献给了阿多诺，阿多诺则把他的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基尔克加特的美学体系》回赠给了这位朋友。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流亡美国，他们都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此基础上，马丁·杰伊指出他们在学术上有着某种关联：任何一个熟悉克拉考尔的人，“不难发现他的著作与阿多诺的一些著作之间的相似”^⑧。

除了阿多诺，克拉考尔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核心成员，尤其是霍克海默、本雅明、洛文塔尔等，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和学术交往。1923年，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圈中颇有影响的克拉考尔，将本雅明介绍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重要核心人物洛文塔尔，也把克拉考尔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并通过克拉考尔的介绍认识了阿多诺。^⑨而克拉考尔的妻子伊丽莎白·埃伦赖希，则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后的始任图书馆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学术“共同体”，其中则包括了克拉考尔和许多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而且，克拉考尔在其中扮演着某种“良师益友”的角色。

在这种深厚的关系背景下，1937年，已经迁移美国的法兰克福学社会研究所向依然流亡巴黎的克拉考尔夫妇伸出了援手。1937年5月3日，作为所长的霍克海默写信给克拉考尔，告知他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电影工业有史以来几乎完整的默片

收藏……德国出品影片几乎完整的收藏”，而且博物馆正在考虑“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德国的社会发展与电影业之间关系”的可能性。霍克海默向博物馆举荐克拉考尔承担该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霍克海默等人还费尽心力帮助克拉考尔获得去美国的签证，确保了计划的实现。1939年6月，纽约电影资料馆馆长约翰·E.阿伯特批准了克拉考尔提交的一项计划，并向克拉考尔提供电影资料馆“特别研究助理”一职。1941年，克拉考尔抵达美国纽约，并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资助，随后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部主管的“特别助理”。^⑩从此，克拉考尔开始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并系统地进行学术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鼎力相助。

然而，尽管克拉考尔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但恰如洛伦茨·耶格尔所说的，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社会学研究所的核心圈子”。这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瑞士学者埃米尔·瓦尔特-布什在他的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1930-1951年间，霍克海默一直都是社会研究所的核心人物，“那么研究所内部，哪些研究人员属于同他紧密合作的小圈子，哪些又位于不很居中的位置？”瓦尔特-布什认为，“答案取决于研究人员为研究所工作的时间，以及工作范围及其对研究所的意义，及对研究规划在数量及质量上所作的贡献”。他通过分析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亲自整理归档研究所内的来往信件的数量，试图了解“不同时间段内，研究所哪些专职、兼职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聘用人员，同霍克海默进行了怎样频繁的通信”^⑪。根据“霍克海默-波洛克资料库”中保存的通信往来名录统计，一共有25位“社会研究所专职或兼职的重要成员”与霍克海默有书信往来，其中克拉考尔与霍克海默之间的往来通信多达112封，在所有成员中可排第13位。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克拉考尔就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

按照瓦尔特-布什的说法，这七位知识分子：霍克海默（哲学家）、波洛克（经济学家）、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家）、弗洛姆（社会心理学家）、马尔库塞（哲学家）、阿多诺（音乐理论家、哲学家）和本雅明（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社会研究所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其中，本雅明的身份最为特别，他从未成为研究所的专职受薪成员，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的论文也不多，甚至也未能成功追随研究所迁移到美国。但由于本雅明的思想追求很接近霍克海默的圈子，尤其更接近阿多诺，而且享有盛誉，所以“理所当然常被视为研究所的核心成

员”^⑩。那么，思想与阿多诺、本雅明同样很接近的克拉考尔，为何没有这样的待遇呢？事实上，这曾经是阿多诺的梦想，但由于作为所长的霍克海默“需要彻底追求更加严格的唯物主义理论形式”，故而把克拉考尔等人排除在研究所的核心圈子之外。罗尔夫·魏格豪斯在《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他（阿多诺）以前曾经为本雅明、克拉考尔、索恩-雷塔尔和布洛赫成为研究所与学刊的合作者而奔走，他的这些努力之所以失败，并不全是因为他本人的过失所致。这些努力表明他的旧梦尚存——那就是梦想着让他所持的理论和他的那些神学-唯物主义朋友们来代表学刊和研究所。但是纳粹胜利以及迁徙国外削弱了这些朋友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学刊的地位，却加强了霍克海默的地位，以至于现在他把霍克海默某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行为也看作是对研究所有利的长期策略的一部分，反过来将克拉考尔以及其他思想伙伴的类似行为视为愚蠢的表现。”^⑪

可见，由于现实的考量和思想的分歧，克拉考尔一直被排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圈之外，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与这个学派之间的紧密关联，更无法抹杀他通过自己的方法和途径，在传播批判理论研究上做出的巨大贡献。

三、克拉考尔的大众传播研究：一种批判理论的路径

克拉考尔作为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社会批评家、社会学家和电影理论家，一生著述颇丰，涉及文化理论、电影理论、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主要代表作有《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认识论探讨》《侦探小说》《雇员们》《大众装饰》《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宣传和纳粹战争片》《电影的理论》等。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涉及大众传播研究，并且深受康德、齐美尔、韦伯、卢卡奇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批判色彩。在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维特曾经指出，克拉考尔“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的观察都是围绕着高雅文化的边缘区域，并且最终落脚在那些通俗文化的媒介上”^⑫。这里所说的“媒介”，包括电影院、街道、体育、轻歌剧、时事讽刺剧、广告和马戏表演等。克拉考尔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集《大众装饰》上。克拉考尔在这本著作中认为，“一个时代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更多地是通过分析它的琐碎的表面现象（surface）确定的，而不是取决于该时代对自身的判断”^⑬。因此，克拉考尔试图通过对某些具体社会表象的探究，深入思考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的某些原则。在他看来：“当可计算性成为必须时，人的共同体和个性消失了；只有作为大众中的一颗微小粒子，人才可以顺利地爬上图表的顶部，也才可以伺候机器。系统，无视形式上的差别，导致对国民性的抹杀，也培育出大量的在全球任何角落都能以同样方式受雇的工人。”^⑭

克拉考尔这种对人及其“异化”的理解，与后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所说的，“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区别在于，不管霍克海默还是阿多诺，都有着浓厚的精英主义意识，他们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其中隐含着对大众文化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鄙视。而克拉考尔则认为，日常生活中看似无关紧要的“通俗文化”，作为一种“琐碎的表面现象”，却能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根本性“原则”。而这种通俗文化，恰恰是克拉考尔始终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其二，关于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关注和批判，几乎贯穿了克拉考尔的整个学术生涯。早在1933年，他就是因为发表了关于社会政治的尖锐批评，被迫离开德国开始逃亡。而在1936年12月，流亡巴黎的克拉考尔为了获得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资助，正式向该机构提交了一份题为《大众与宣传：对法西斯宣传的考察》的研究计划。这份报告的核心是准备分析“宣传在法西斯主义中的作用”。克拉考尔认为，法西斯主义者通过三种方式使大众的性格在宣传中具体化：首先，通过大众集会、大众游行等方式，使大众感觉到自身无处不在，并且经常是以装饰或者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出现；其次，借助于广播，起居室也被改造成了公共场所，法西斯主义宣传留给个人的只剩下“内心”这块领地，并且也还试图将它改造成大众的一个构成要素；最后，法西斯主义者努力“抽离大众中所蕴藏的任何神秘力量”，持续不断地炮制一种大众崇拜。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为制造的大众”的“虚假整合”。不过，当时同样处于流亡状态并且已经四分五裂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最终没有接受这个研究计划，以至于克拉考尔向阿多诺抱怨：“你们并没有认真编辑我的手稿，而是拿它构思了一篇新作！”^⑯当然，对于克拉考尔而言，即使研究计划没有被接受，但他关于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研究并没有终止，而是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他流亡美国后得到了更为系统的发挥。

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针对纳粹的研究是许多流亡学者的共同选择，比如心理学家克里斯开始研究纳粹的宣传；哲学家卡西尔、阿伦特等探索国家的神话和极权主义的起源；小说家如托马斯·曼转而

写关于德国分裂的寓言。^①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也不例外。尽管当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没有接受克拉考尔的研究计划，但他们自身却不可避免地介入了对纳粹的研究。对此，就像马丁·杰伊所说的：“研究所独特的理论装备‘发挥了重大作用’：批判理论被运用到当时最紧迫的问题上，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②。法兰克福学派在迁离欧洲之前，就已经转而关心权威问题，霍克海默对心理分析的兴趣，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可以帮助解释社会的心理“凝聚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单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而言，克拉考尔显然毫不逊色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

其三，关于电影媒介的批判研究。在克拉考尔的众多著述中，有关电影的研究始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克拉考尔曾在《法兰克福报》担任过影评部的负责人，写过大量与电影有关的专栏，更重要的是，在电视和网络媒体尚未出现的20世纪早期，电影作为一种与广播并驾齐驱的大众传媒，有着强大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功能。就像传播学者麦奎尔所说的：电影作为科技新事物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几乎快速地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媒介，因为它能够快速地向大多数的大众进行传播”。^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照片、电影、无线电通讯等以大众为对象的“新媒介”已经被投入到了战争之中，其宣传效果被比拟成前线上肉眼看不见的毒气弹。而在德国，有声电影的兴起与纳粹的抬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自1927年党大会之后，纳粹党就开始进行宣传电影的制作，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运动中，已有能力在全国各地组织观看内容为希特勒演说的纪录

片。^④面对这种状况，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们，都把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性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就反复强调：对于观众来说，有声电影“没有留下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观众不能在影片结构之内做出反应……就这样，电影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⑤。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有关于电影媒介的批判研究中，克拉考尔的巨著《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无疑是出类拔萃的。这是一部战时写于美国的著作，它的任务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框架内研究纳粹主义的特点，因为“合众国希望更了解它的敌人，以便更充分地备战”^⑥，但实际上，这同时也是一部具有理论色彩和强烈批判性的论著。克拉考尔在这部著作中认为：有两个原因使电影“比其他艺术媒介更直接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首先，电影绝非个人作品。每部影片的摄制组都表现为一个集合了各色兴趣和爱好的混合体。片场里的团队合作排斥对银幕素材的独断处理，它压抑个人特性，支持多数人的共性。其次，电影面向无名大众并要投合后者的心意。因此，受欢迎的影片，应该满足现有的大众欲望。在此基础上，克拉考尔试图在经济转型、社会危急和政治图谋的显性历史背后，探寻德国民众内在习性的隐秘历史。^⑦在这部著作里，克拉考尔被认为开辟了探查电影与民族心理，以及社会政治之间联系的新领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但如果我们将电影作为一种单纯的“大众传媒”，那么克拉考尔的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传播批判理论研究的另一条路径。

注释：

- ①③④⑦⑨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6、86、89、86、82页。
- ② 李政亮：《柏林文化状况中的克拉考尔——从生命经历到电影观念》，《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
- ⑤⑥ [德] 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1、24页。
- ⑧⑨⑩ [美]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36、136页。
- ⑪⑭ 莱奥纳多·夸雷斯玛：《重读克拉考尔》，载[德]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黎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页。
- ⑫⑬ [瑞士] 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0、21页。
- ⑬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页。
- ⑮⑯⑰ [英]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4、197、197、232-233页。
- ⑱⑲ [德] 霍克海默、[德]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141页。
- ⑳ [英] 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 ㉑ [日] 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诸葛蔚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84页。
- ㉒ [德]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黎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0页。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毓强】